

以数智技术赋能干部教育提质增效

中共伊春市委党校 霍宁

数智技术深刻重塑信息传播方式、干部认知模式与教育培训形态。推动数智技术与干部教育深度融合,是以数字引擎重构干部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依托数智技术全面提升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与成效评价的能力水平,让干部教育在数字化浪潮中始终保持时代性、彰显感召力、富有实效性,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注入强劲动能。

一、搭建智慧学习平台,精准赋能理论教育

理论教育是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课堂讲授在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精准适配不同岗位、层级干部的差异化学习需求上仍有提升空间。数智赋能是推动理论教育精准施教的核心抓手,搭建专属智慧学习平台,推动理论教学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一是建立干部理论学习数字档案库。整合干部在线学习数据、课堂研讨发言、理论测试成绩、调研成果等多维度信息,运用数据挖掘等技术,对学习数据与研讨文本同步分析,动态标注每名干部的理论认知短板、关注热点、学习偏好,建立一人一档、动态更新的学习

台账,清晰掌握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干部的理论需求差异,差异化匹配教学专题、辅导读本与定制自测题库,真正实现分层分类、一人一策的定制化理论供给。二是运用知识图谱技术活化理论呈现。依托知识图谱技术构建理论知识网络、梳理概念关联,结合可视化交互技术打造交互式数字研学载体,干部可通过移动端拖拽查阅、检索溯源、自主研学,理清理论内在逻辑、把握实践落点,改善理论学习枯燥难懂的固有感受,推动理论从书本文字变为可感知、可追溯、可运用的思想工具,持续提升理论武装的穿透力。

二、打造沉浸数字场景,深化党性教育实效

党性教育是干部教育的灵魂。线下授课、现场教学在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性修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受时空条件限制,部分教学场景的代入感与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数智技术的独特优势在于打破时空壁垒、重构教育场景,让传统课堂的讲授内容转化为鲜活可感的实景情境,让历史精神直抵干部内心,实现“被动听课”向“主动体悟”的转变,让党性教育走向“身临其境”。

一是搭建全景式党性教育数字场景资源库。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复刻历史场景,让干部“走进”革命旧址、“重走”雪山草地、“见证”时代变革,在数字场景沉浸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二是搭建廉政教育与履职实训数字场景。开发交互式廉政仿真课堂,结合政绩观典型案例开展分支式情景模拟,根据干部选择动态推演剧情走向、同步提示纪法风险,直观呈现违纪违法的深刻教训,让干部在沉浸式决策体验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同时搭建基层治理、群众工作、应急处置等虚拟实训场景,通过交互式情景推演让干部在模拟处置中强化宗旨意识、提升履职能力,真正实现从“被动听学”向“主动悟行”的教育转变,让党性教育既有政治高度、更有情感温度,充分释放数智技术赋能党性教育的深层感染力。

三、构建长效数智评价,完善干部教育闭环

成效评价与长效管理是干部教育提质增效的关键闭环。传统干部教育培训评价以理论测试为主,存在维度单一、反馈滞后等局限,难以精准反映干部能力素养提升实效。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构建数据驱动的全周期评价

与管理体系,贯通“需求—教学—评价—迭代”完整链条,可显著提升干部教育的科学性、精准性与持续性。

一是打造多维度数字化评价模型。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整合分析理论测试、研讨发言、实践实训等多维度数据,打破“重结果、轻过程”局限,构建涵盖理论素养、党性修养等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定性 with 定量评价相结合,强化发展性评价权重,通过前后数据对比呈现干部能力成长幅度,生成个性化能力成长画像,为干部自我提升与组织识人用人提供参考,推动评价从“终结式判定”向“过程式赋能”转变。二是建立教学迭代与安全保障双轮驱动机制。依托评价数据分析反向梳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资源供给的薄弱环节,针对干部能力提升共性短板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与形式,形成“评价反馈—优化调整—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推动培训体系持续迭代。同时,筑牢数据安全和内容安全双重防线,严格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与使用流程,依托智能内容审核机制健全风险预警体系,实现教学质量提升与安全风险防控协同推进。

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分布与特征

铜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闫伟

安徽省红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数量多、规模大、类型齐整,而且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此外,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区域性、政治性与教育性的基本特征,为其有效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教学奠定了全方位的坚实条件。

一、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重在“红色”二字,“红色”并非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是对其政治意识的定性与价值指向。“安徽红色文化资源”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所创造的,具有安徽特色的文化资源形态。对于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理解,学界有所关注,形成了多种观点,如江毅认为从资源的种属层面看,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大主类(遗址遗迹类、建筑与设施类、人文活动类)和八大亚类(遗址遗迹类、综合人文旅游区、单体活动场馆、名人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陵区陵园、交通建筑、人事记录、红色艺术),而孔海棠则提出安徽红色文化资源按照资源主体划分主要有四大类,即革命遗址、红色名人、红色精神文化与红色历史研究成果。不过,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形态类别,将安

徽红色文化资源分为物化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资源两大类较为合宜。概括而言,物化形态的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包括革命老区与根据地、战争遗址旧址等历史遗存、革命烈士陵园与纪念馆纪念碑、革命时期的物质文化产品、红色经典与文化作品等;精神形态的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包括大别山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江精神、小岗精神(大包干精神)、沈浩精神、王家坝精神等。

二、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

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皆有体现。首先,在时间分布上,安徽红色文化资源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质相符合,可以分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双堆集精神)、以“建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佛子岭水库、淠史杭精神)、以“发展”为主题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如淮河防汛纪念馆、王家坝精神)、以“创新”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如金寨县大湾村、科技报国精神)。其次,在空间分布上,安

徽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且在安徽各个区域都有分布,如皖南有泾县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及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皖西有独山革命旧址群、霍山县诸佛庵镇革命旧址、皖北有蔡洼淮海战役总前会议旧址、皖中有板子矶渡江战役第一登陆点纪念碑、皖东有龙岗抗大八分校纪念馆及旧址群等。从安徽各地遗存的红色文化资源看,相对皖北与皖东地区,皖南与皖西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分布更为密集,而且历史层级更高、资源类型更加丰富,大概与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革命历史地位与周期存在很大关系。

三、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

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要从红色文化资源自身的属性层面进行探讨。总体来说,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区域性特征彰显为以下几点:空间分布不均衡,皖南与皖西呈现出聚集性的特征,具有“南重北轻,西密东疏”的格局;与地理环境高度关联,大别山区为核心承载区;传统地域文化与红色文化高度融

合,徽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结合锻造了极具个性的安徽红色文化资源。

其二,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政治性的特征。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特征具有多方面的体现:安徽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方向;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和服务于人民,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群众基础;安徽红色文化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其三,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教育性的特征。首先,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情境性,红色文化资源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人物、实物为依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次,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非知识性,内含理想信念、价值信仰、意志情感、道德情操等内容;再者,安徽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体验互动性。

基金项目:铜陵学院校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重点项目(2024xj031);铜陵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研究专项课题重点项目(tlxyszzd202514)。

曾山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思想与实践

江西财经大学 刘衍钧

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财经工作的早期开拓者,也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创建者之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深耕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治理一线,务实担当、善于破局,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相持阶段,华中敌后局势严峻复杂,日伪在军事“扫荡”、政治“清乡”的同时,大肆开展经济掠夺与封锁,叠加国民党反共摩擦、连年自然灾害,造成根据地物资紧缺、物价暴涨、财政巨额亏空,给敌后持久抗战带来严峻挑战。1943年,曾山受命主持华中根据地财经工作,立足敌后斗争实际,紧扣抗战中心任务,系统推进财经治理改革,有效扭转了根据地经济被动局面,为坚持敌后抗战、稳固抗日民主政权夯实了物质基础。

一、立足抗战实际,树立战时财经理念

面对敌后物资匮乏、外援有限的艰难处境,曾山清醒认识到,被动依靠外部补助和增加税负难以维系长期抗战,唯有自主发展、坚持生产自救,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经济困局。他明确提出:“今后必须从积极方面打算,必须放到依靠自己动手,自己劳动的生产上面”,将自力更生确立为华中战时财经工作的根本方针。在具体工作中,曾山始终把握两条底线。一方面坚持抗战优先,各项经济布局、财政开

支、物资调配,均服务对敌斗争核心需要,全力保障部队作战和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坚持兼顾民生,全面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削弱封建剥削,合理调整社会负担,扶持城乡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在保障战争供给的同时改善群众生活,为根据地财经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清晰思路。

二、深耕生产财税,夯实根据地经济根基

为破解物资短缺、财税混乱难题,1943年起,曾山从生产建设、财税整顿双向发力,夯实根据地经济根基。他推动华中局下发系列生产动员文件,掀起全域军民大生产运动。1944年4月,华中局明确硬性生产指标,要求部队直属队自主解决八个月伙食费,每名干部、战士完成种植青麻3斤、自织草鞋2双的生产任务。根据地军民全员参与开荒种粮、纺纱织布,党政军主动帮扶群众解决生产难题,扶持基层生产合作社发展,有效缓解物资供给压力。财税方面,根据地全面废除苛捐杂税,推行阶层合理负担政策,重点向中上层群体征税,切实维护贫苦工农利益。同时建立预决算、金库管理、会计审计等正规财政制度,常态化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工作,规范收支管理,让财政资金精准服务抗战与民生。

三、统筹金融贸易,掌握经济斗争主动权

金融混乱、贸易闭塞是制约根据地发展的突出短板。抗战前期,华中根据地地域分割、金融各自为战,币种繁杂、互不通用,严重阻碍物资流通,也让日伪得以利用伪币、法币扰乱市场、套取战略物资,持续冲击根据地经济秩序。1945年,曾山牵头成立华中银行筹备处,突破敌人封锁完成建厂、印钞规范制定等工作。同年8月华中银行正式成立,下设14个县市支行、32个办事处,组建千人专业队伍,统一发行华中币作为根据地本位货币。依托金银、粮油、盐棉等充足实物储备,华中币币值稳定、公信力强,通过回收旧币彻底肃清金融乱象,抵御了敌伪货币冲击。同时,他构建分级战时贸易体系,对内放开市场、激活流通,联动各解放区协同发展;对外严控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通过专业外贸机构置换军需民生物资,成功突破敌人经济封锁。

四、坚持统筹兼顾,彰显大局治理担当

曾山始终坚持全局思维,秉持“抽肥补瘦、互助共济”原则统筹全域财经工作。抗战时期,华中各地财政独立运转,收支失衡,累计亏空1.5亿元法币,军政保障压力巨大。在此背景下,他统筹调配苏中富庶区域物资财力,重点支援七师、江南六师等敌后艰苦作战部队,同时筹措物资支援华北八路军作战,彰显了共

产党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革命担当。此外,他高度重视战时经济情报工作,组建专项力量研判市场物价、物资流向和经济态势,为财经决策、货币斗争和物资调配提供精准支撑。经过系统性治理,截至1944年底,华中各解放区及游击区总人口达3154万余人,根据地综合实力和抗战根基得到显著巩固。

五、总结实践经验,传承红色财经思想

曾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治理,是党战时经济建设的宝贵实践。他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战时实际,统筹战时保障与民生改善、局部建设与全域大局,以生产自救破解困局、以制度整顿夯实根基、以金融斗争掌握主动,有效化解敌后经济危机,稳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些实践丰富了党的经济理论,为解放区建设和新中国财政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曾山在治理中彰显的实事求是、心系群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诠释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与担当,为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夯实民生根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红色滋养。

作者简介:刘衍钧(199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